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编



日本學

第十一輯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PDG



ISBN 7-80173-027-5



9 787801 730275 >

新平州 婦岡

ISBN 7-80173-027-5

C·001 定价: 35.00元

日 本 学

第十一辑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学:第11辑/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1
ISBN 7-80173-027-5

I.日... II.北... III.日本-研究-文集
IV.K313.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01286号

日本学 第11辑

主 编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张贵来 李正堂
封面设计	秋 实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公大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32开
	16.75印张 420千字
版 次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73-027-5/C·001
定 价	35.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地址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电话:64271187 64279032
传真:84257656
E-mail:icpc@95777.com

沉痛悼念周一良先生

本刊编辑委员会

2001年10月23日凌晨5时,中华日本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学术顾问、著名学者周一良教授,因病溘然长逝于北京蓝旗营寓所,享年89岁。

周一良先生自幼苦学日语,1935年撰写论文《大日本史之史学》而毕业于燕京大学,从此与日本史研究结下不结之缘。1937年译中村久四郎之《利玛窦传》。1939年入哈佛大学远东语言系,主修日本语言文学。1944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讲授日语。1946年回国,历任燕京大学国文系副教授、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历史系教授兼任系主任。1952年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先后兼任中国古代史、亚洲史教研室主任、副主任和系主任,主讲日文、佛典翻译文学、中国古代史、魏晋南北朝史、日本史、亚洲史、历史文选等课程。

周先生堪称学贯东西的大学者,一生撰述丰富,大都收入五卷本的《周一良集》。各卷分别为《魏晋南北朝史论》、《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佛教史与敦煌学》、《日本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杂论与杂记》,如实记述了周先生的学术足迹和治学特色。概言之,周先生治学博大精深,学术视野广阔,东西兼顾,堪称学术造诣深厚的一代宗师。

周先生是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1952年开讲亚洲史,1958年出版专著《亚洲各国古代史》。其中,日本古代史研究

居颇大比重,为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开拓性的尝试。1964年创建历史系世界史研究室,1974年参与创建同研究室的日本史组,撰写学术论文,编译日本史研究动态资料,制定发展规划,指导并培养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桃李灼灼,代有传人,奠定了北大日本史研究的基础。1980年以来任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推动全国的日本史研究。

周先生热心中外文化交流,业绩卓著并饮誉海内外。周先生曾前往美亚欧非四大洲十余国讲学或出席国际会议,展示中国学者的实力与风采。曾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人类科学与文明发展史》第三卷编委会委员,主撰日本、朝鲜两节。1997年以《中日文化关系史论》等论著和研究日本文化的出色成就,荣获山片蟠桃日本文化研究大奖。这个奖项专为外国学者所设,一年一名,已授与十余人,中国学者获此大奖者,惟周先生一人而已。周先生通过辛勤的劳作,为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赢得了荣誉。

周先生胸襟坦荡,诚恳谦虚,待人宽厚,奖掖后学。他淡泊名利,追求真理,潜心钻研学术,持毕竟是书生的平常心,面对人生坎坷而视个人荣辱得失如浮云。

周先生的逝世,是我国教育界、学术界和日本史学界的巨大损失。我们为失去德高望重、学艺精深的导师而无限惋惜与悲痛。我们将永远铭记周先生的人格魅力与学术业绩,为继承光大周先生的未竟学术事业而奋斗不息。

悼念周一良

季羨林

最近两个月来,我接连接到老友逝世的噩耗,内心震动,悲从中来。但是,最出我意料的、最使我哀痛的还是一良兄的远行。

九月十六日中国文化书院在友谊宾馆友谊宫为书院导师庆祝九十华诞和米寿举行宴会。一良属于“米寿”的范畴,是寿星老中最年轻的。他虽已乘坐轮椅多年,但在那天的宴会上,虽称不上神采奕奕,却也面色红润,应对自如。我心里想,他会活上若干年的。就在几天前,在十月二十日,任继愈先生宴请香港饶宗颐先生,请一良和我作陪。他因身体不适,未能赴宴,亲笔签了一本书,送给饶先生。饶先生也在自己的画册上签上了名送给他。但在两天后,杨锐想把这一本书送到他家时,他已经离开了人世。多么突然的消息!据说,他是在睡梦中一个人悄没声地走掉的。江淹说:“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一良的逝去,既不饮恨,也不吞声。据老百姓的说法,这是前生修来的。鲁迅先生也说,死大概是有点痛苦的;但一个人一生只能有一次,是会过得去的。一良的死却毫无痛苦,这对我们这些后死者也总算是一种安慰了。

一良小我两岁,在大学时至少应该同学二年的。但是,他当时在燕京读书,我则在清华。我们读的不是一个行当,即使相见,也不会有深交的。可以说,我们俩在大学时期是并不认识的。一直到1946年,我在出国十一年之后回到北平,在北大任教,他在当时的清华任教。此时我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已经有一部分相同了。

因为我在德国读梵文，他在美国也学梵文。既然有了共同语言，订交自是意中事。我曾在翠花胡同寓舍中发起了一个类似读书会一类的组织，邀请研究领域相同或相近的一些青年学者定期聚会，互通信息，讨论一些大家都有兴趣的学术问题，参加者有一良，翁独健等人。开过几次会，大家都认为有所收获。从此以后，一良同我之间的相互了解加深了，友谊增强了，一直到现在，五十余年间并未减退。

一良出自名门世家，家学渊源，年幼时读书条件好到无法再好的水平。因此，他对中国古典文献，特别是史籍，都有很深的造诣。他曾赴日本和美国留学，熟练掌握英日二国语言，兼又天资聪颖，个人勤奋，最终成为一代学人，良有以也。中年后他专治魏晋南北朝史，旁及敦煌文献，佛教研究，多所创获，巍然大师，海内无出其右者。至于他的学术风格，我可以引汤用彤先生两句话。有一天，汤先生对我说：“周一良的文章，有点像陈寅恪先生。”可见汤先生对他评价之高。在那一段非常时期，他曾同人合编过一部《世界通史》。这恐怕是一部“应制”之作，并非他之所长。但是，统观全书，并不落俗人窠臼，也可见他对史学功底之深厚。可惜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长才未展，他留下的几部专著，决不能说是已尽其所长，我只能引用唐人诗句：“长使英雄泪满襟”了。

一良虽然自称“毕竟一书生”。但是据我看，即使他是一个书生，他是一个有骨气有正义感的书生，决不是山东土话所称的“孬种”。在十年浩劫中，他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炙手可热的“老佛爷”。当时北大大权全掌握在“老佛爷”手中，一良的命运可想而知。他同我一样，一跳就跳进了牛棚，我们成了“棚友”。我们住在棚中时，新北大公社的广播经常鬼哭神嚎地喊出了周一良、侯仁之、季羨林的名字，连成了一串仿佛我们是三位一体似的。有一次，忘记了是批斗什么人，我们三个都是“陪斗”。我们被赶进了原大饭厅台下的一间小屋里，像达摩老祖一样，面壁而立。我忽

然听到几声巴掌打脸或脊梁的声音，清脆“悦”耳，是从周一良和侯仁之身上传过来的。我想，下面该轮到我了。我肃穆恭候，然而巴掌竟没有打过来，我顿时颇有“失望”之感，忽听台上一声狮子吼：“把侯仁之、周一良、季羨林押上来！”我们被两个壮汉反剪双臂押上台去，口号声震天动地。这种阵势我已经经受了多次，已经驾轻就熟，竟不心慌意乱，熟练地自己弯腰低头，坐上了喷气式。至于那些野狗狂叫般的批判发言，我都充耳不闻了。这一段十分残酷然而却又十分光荣的回忆，拉近了我同侯仁之和周一良的关系。

一良是十分爱国的。当年他在美国读书时，曾同另一位也是学历史的中国学者共同受到了胡适之先生的器重。据知情人说，在胡先生心目中，一良的地位超过那一位学者。如果他选择移民的道路，拿一个终身教授，搞一个名利双收，直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然而他却选择了回国的道路，至今已五十余年矣。在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中，他走过的道路，有时顺顺利利，满地繁花似锦；有时又坎坎坷坷，宛如黑云压城。当他暂时飞黄腾达时，他并不骄矜；当他暂时堕入泥潭时，他也并不哀叹。他始终无怨无悔地爱着我们这个国家，我从没有听到过他发过任何牢骚说过任何怪论。在这一点上，我虽驽钝，也愿意成为他的“同志”。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始终维持着可喜的友谊。见面时，握手一谈，双方都感到极大的快慰。然而，一转瞬间，这一切都顿时成了过去。“当时只道是寻常”，我在心里不禁又默涌起这一句我非常喜爱的词。回首前尘，已如海上蓬莱三山，可望而不可即了。

我已经年逾九旬。我在任何方面都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包括年龄在内，能活到这样高的年龄，极出我的意料和计划。世人都认为长寿是福，我也不敢否认。但是，看到比自己年轻的老友一个个先我离去。他们成了被哀悼者，我却成了哀悼者。被哀悼者对哀悼这种事情大概是不知不觉的。我这哀悼者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七情六欲，件件不缺。而我又偏偏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我内

心的悲哀实在不足为外人道也。鲁迅笔下那一个小女孩看到的开满了野百合花的地方,是人人都必须到的,问题只在先后。按中国序齿的办法,我在北大教授中虽然还没有达到前三甲的水平,但早已排到了前列。到那个地方去,我是持有优待证的。那个地方早已洒扫庭除,等待我的光临了。我已下定决心,决不抢先使用优待证。但是这种事情能由我自己来决定吗?我想什么都是没有用的。我索性不再去想它,停笔凝望窗外,不久前还是绿盖擎天的荷塘,现在已经是一片惨黄。我想套用英国诗人雪莱的两句诗:“如果秋天到了,冬天还会远吗?”闭目凝思,若有所悟。

2001年10月26日



目 录

沉痛悼念周一良先生·····	本刊编辑委员会(1)
悼念周一良·····	季羨林(3)
元禄町人的价值伦理与对身份道德的挑战·····	刘金才(1)
近世日本回归华夷秩序的努力与挫折·····	陈文寿(21)
获生徂徕的封建论及其对宋儒的批判·····	张允起(47)
论安藤昌益的社会发展观·····	左汉卿(60)
论福泽谕吉的朝鲜观·····	牟晓春(81)
论近代日本的“兴亚论”思潮	
——以内藤湖南“文化中心移动说”为中心·····	钱婉约(99)
近代转型期的天皇制和宗教·····	[日]安丸良夫(115)
吉野作造的国际政治思想·····	王超伟(129)
岛原天草起义试论·····	沈仁安(146)
从财阀垄断到法人垄断	
——日本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性与现代转型·····	江瑞平(159)
近代日本对华认识的一个断面	
——伪满的国都规划过程·····	沈海涛(181)

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	胡 澎(201)
美国对日占领政策与日韩关系·····	安成日(217)
后“55 年体制”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魏梦太 王新生(234)
日本“信息公开制度”的确立过程·····	曾勇明(250)
日本右翼史观的文化分析·····	贾蕙莹 孟 雅(266)
隋唐时期的中日茶文化交流·····	滕 军(278)
论池田大作的新人道主义·····	冉 毅(300)
初诣的形成与日本近代国民国家意识·····	李凡荣(313)
日本的灵魂作祟信仰·····	刘琳琳(331)
日本刀文化初探·····	王亚宏(343)

中国日本学的奠基人——黄遵宪研究述评·····	王晓秋(355)
战后日本史学界国粹主义研究·····	戴 宇(366)
日本对明治转型期财政史的研究·····	湛贵成(383)
战后日本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研究论考·····	诸葛蔚东(397)
日本史研究的动向与日中研究交流的意义·····	[日]池 享(419)
横滨开港考·····	张晓刚(435)

小议《源氏物语》的文学渊源·····	叶渭渠(448)
壶井繁治诗歌简论·····	刘光宇(474)

新书、新角度、新观点

《日本史研究序说》简介·····	(485)
《日本十首相传》简介·····	(486)
《町人伦理思想研究——日本近代化新论》简介·····	(487)
《政治体制与经济现代化》简介·····	(488)
黄遵宪与中日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介绍·····	(489)
法隆寺的建筑尺度·····	(491)

天皇制新论	(492)
日中文化比较论	(494)
日本教育改革动向	(495)
“新历史教科书”的问题点	(496)
《日本学》1—10 辑目录	(497)

元禄町人的价值伦理与对身份道德的挑战

刘金才

在日本近世的元禄时代^[1],逐渐掌握了商品经济主导权和经济实力的新兴町人,不仅以豪奢享乐之风和反禁欲主义精神对抗武士阶级的禁欲主义伦理,而且在经济生活和道德生活中,建构起自己以金钱为本位的价值伦理和形成金钱面前人人平等的阶级意识,这对武士阶级基于身份制的权力本位价值观和身份道德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町人小说家井原西鹤(1642—1693)、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町人学者西川如见(1648—1724),分别以各自不同的形式表现和彰显了这种新兴町人应有的价值取向和伦理精神。本文将以西鹤的经济小说“町人物”、近松的町人戏剧作品“世话物”^[2]和如见的町人训诫性著作《町人囊》^[3]等为材料,对元禄町人的金钱价值观念、致富伦理以及阶级意识的觉醒等特征进行考察和探讨。

一、西鹤的金钱本位思想及致富伦理

元禄町人所追求的伦理价值目标,当豪奢享乐之风和反禁欲主义思潮受到纲吉恐怖政治和道统思想家们的强力“压制”时,就开始转向了强调以金钱为本位的价值取向和以积蓄金钱为目的的人生观。“元禄三文豪”^[4]之首的井原西鹤,作为置身于封建等级差别社会中町人的一员,既深深感受到了纲吉恐怖政治的压抑,同

时也敏感地意识到了“惟有金银闪光”(《西鹤织留》)世道的来临及町人价值取向的变化趋势,故而从描写表现町人反禁欲主义的“好色小说”(好色物)进而转向描写表现町人以金钱为本位发家致富的经济小说“町人物”。毫无疑问,他自己也“开始转向了肯定金钱力量和以积蓄金钱为目的的人生观”^[5]。

事实上,元禄町人的金钱本位的价值取向,在17世纪中叶特别是自宽文年间(1661—1673)开始的新兴町人快速发展时期就已充分表现出来,并在进入元禄时期广泛支配了町人的经济生活和道德生活。西鹤“町人物”的代表作《日本永代藏》、《世间胸算用》(《世间如意算盘》)、《西鹤织留》^[6]中有关町人发家致富及其金钱价值意识的素材,大多是取之于元禄初期以前近三十年间町人的现实经济生活,只是在西鹤未将其以小说形式广播于世和为其张目之前,未能形成强劲的时代思潮而已。

西鹤有关金钱本位的思想首先表现在其“町人物”的第一部代表作《日本永代藏——大福新长者教》^[7]之中。例如在本书第一卷的开篇“初午参拜好运来”中,西鹤在描写以正直、才智致富的町人典型之前,先开宗明义地阐明了世间应以金钱为本位、积蓄金钱的中心思想。

人生最大之事,存身立命之业,无论士农工商,抑或此外出家、神职之人,均应奉俭约为大明神之神托,积蓄金钱。此乃双亲以外生命之父母也。人生长则不知朝明,短则惊于夕钟。故而有云,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明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生命如瞬间之烟,死后金钱尚莫如瓦砾,携至黄泉亦丝毫无用。然其若留于后世,则可造福于子孙。暗自思之,世上所有愿望,用金钱难偿者天下只有五,此外皆可以得偿也。世上还有胜过于此的宝物吗^[8]?

《永代藏》开篇的这段论述,集中表明了西鹤有关金钱价值重要性的认识和思想。我们仔细阅读分析这段论述可以发现,西鹤实际是从“超越阶级和圣俗”、“超越时间”和“超过万物”三个角度强调了金钱的重要性。即:其一,西鹤提出“无论士农工商,抑或出家、神职之人,均应视俭约为大明神之神托,积蓄金钱”,意在强调金钱的重要性和积蓄金钱的必要性,不是只适用于某个阶级或者只局限于俗世之人,而是不分阶级身份和职业的尊卑差异以及“圣俗”(宗教世界与世俗)的区别,适用于所有世间之人。并且,西鹤通过将俭约积蓄金钱视为大明神降予士农工商及神职人员的神谕,表明了他试图将赚取积蓄金钱行为正当化和神圣化的思想;其二,西鹤称“天地”为“逆旅”、“光阴”为“过客”,“浮生若梦”、“生命如烟”、“人生长短无定”,其主旨并不是像以往多被人们解释的他似乎是在“主张佛教消极的无常观”^[9],而是要以这种“无常观”反衬金钱的生命和价值比“天地”、“光阴”、“浮生”和“寿命”还要久远和实在,强调金钱具有超越“时间”的功用。即西鹤在着意说明,尽管从无常观的思想角度看的确是“人死后金钱不如瓦砾,携至黄泉亦丝毫无用”,然而就金钱的生命价值而言,它“若留于后世”则具有“造福子孙”的超越时代的巨大功用;其三,西鹤在这里已不仅仅是像“好色小说”中那样为“满足爱欲”而肯定金钱的作用,而是把金钱提高到了“除亲生父母外的生命之父母”、可达成人间除生老病死^[10]外的所有愿望、“超过世间万物的最宝贵之物”的地位,即把金钱视作了“万物之尊”和“万能之物”,以此为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但握有金钱势力的町人阶级伸张其金钱本位价值取向的合理性。

西鹤这种金钱本位的思想,在其《日本永代藏》、《世间胸算用》和《西鹤织留》以及其他几乎所有的“町人物”之中到处可见。例如,西鹤在《永代藏》卷四的“播种福种之钱”中说:“世上唯金钱最有趣(价值)”^[11];在卷三中强调:“只要有金钱就万事可成”,“(若

有了金钱)既能有成佛之心,又能为后世造福,万人羡慕”^[12];在《西鹤织留》卷一中说:“富贵藏其恶,贫穷现其耻。有钱势之人说话,即使蛮横无理亦可通行,而无钱渡世之人所言,即使于他人有益,亦无人听。毋庸讳言,此乃万事皆需金钱,没钱即无于此世生存价值之故也”^[13];在《万之文反古》卷五中说:“世上最悲哀者莫过于没有金钱”^[14];在《世间胸算用》中说:“世界无有他物,有的只是金钱”(卷四),“商事全靠心计算,世上惟有金钱在”(卷五)^[15]等等。为了强调金钱的作用,《西鹤大矢数》第三十八节中还写有这样的连句:“真正初濂之观音,极乐之光一枚金。”^[16]即是说,西鹤认为,金钱不仅是世人所必需,即便是作为神的初濂观音,它之所以成为真正的观音,也是要靠有一块金子的光辉,才得以显示出“极乐之光”。

然而,如此强调金钱的魔力和价值,并不是西鹤创作“町人物”乃至其精神追求的最终目的。其根本目的在于以金钱本位的思想为基础,建构起他理想的町人形象、町人价值观和致富伦理。具体而言,西鹤试图表现如下的伦理思想和精神。

(1)通过强调金钱的价值,树立町人阶级自己的价值观。西鹤强调“人没有金钱就无于此世生存之价值”、“归根结底,世上惟有金银之光辉”(《西鹤织留》),自然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而言的,但更主要是基于被置于四民之末的町人(商人)立场而言的。在西鹤看来,“一切人天生都长有五官和手脚,人人都长有一颗心,万人皆同本无差异”,但是在现实中,“带刀者成为武士,握锄者成为百姓,执算盘者成为商人”^[17],被赋予了阶级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处于四民之末的町人,只有“营利赚钱”才有自己的事业,只有具有了金钱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才能立足于世。町人“除金钱之外别无长物”,只有肯定了金钱的价值,才能肯定町人的价值,只有确立了金钱本位价值意识,才能树立起町人阶级自我的价值意识。因此,西鹤在其“町人物”中,以“天下之町人”的阶级觉悟和自负